序　论

在这本小册子里，我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对马克斯·韦伯的思想进行探索。要进入一座迷宫的中心，别无它途，而韦伯确实就是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一座迷宫。令人失望的是，在许多真正的迷宫中心常常一无所有。然而，对于在韦伯这座迷宫中辛勤探索的人来说，是不会遇到这种情况的，虽然在我看来埋藏在这座迷宫中心的东西比人们通常期望的要少，但是，正是这座迷宫及其宝藏，使得韦伯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本世纪在社会思想上富有创新的著名人物之列。

尽管韦伯的著作，除两三本正式的讲演集以外,所使用的语言十分深奥难懂,但由于篇幅所限，在书中我尽量避免作过多的学术性注解，并尽可能避免出现德语词汇。结果，我在叙述中有意使用了隐喻,同时尽力做到不歪曲韦伯的思想。我希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望这样可以有助于解开社会科学家韦伯的思想之迷团，并且紧密结合韦伯在迥然不同的文化环境中的特殊生平问题，给研究者提供一份韦伯的思想路线图式。但是，我充分意识到，对于一个思想丰富而复杂的学者的探索，是永远没有止境的。

D·G· 麦克雷

第 1 章

韦伯的声望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于1920年6月14日下午5时左右溘然去世。这一天阴霾密布，细雨纷纷。当韦伯学生卡尔·勒文施泰因到慕尼黑的泽斯特拉斯的韦伯家中看望老师时，他发现病人独自躺在床上。勒文斯泰因在韦伯床前呆了几分钟，亲眼见到自己的老师与死神进行最后的斗争，然后就告别出来。韦伯的妻子玛丽安妮此时正在屋里其它地方休息着。勒文施泰因离开不久，韦伯就在孤独和寂寞中与世长辞了。韦伯享年五十六岁，在慕尼黑他的教授交椅上只坐了几个月。如果当时他不死的话，他还想在慕尼黑大学的下一个学期讲授有关社会主义的课程。

他的死是一场流行性感冒长期折磨所致。1918年开始猖獗起来的这场流感杀死的人，据说比1914年至1918年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多。到1920年，这种传染病的确已很难致人于死了，但是所有欧洲人仍然被生活必需品的匮乏和食品定量供应制弄得孱弱不堪，对于流感患者的隔离措施也很不严格。韦伯的遭遇正是当时这种情况的一个缩影。他在当年初夏之际所患流感转变成了肺炎，而肺炎——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化学疗法诞生之前——通常是致命的。学者，尤其是在新兴的课题中有独创性的学者，常常是大器晚成的。人们常常作出这样的假定，韦伯临死时，已经开始着手对自己一生的研究进行综合。但是这种假定纯属猜测性的，不能作为证据。他的声望在他逝世后直线上升，他的名字在今天肯定也比在他生前要更加广为人知。为什么韦伯死后能够享有这样高的声望呢？我认为，声望标准一般涉及以下四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很普通的。本世纪六十年代的一个时髦是，新闻记者及其他人用"超凡魅力"[1]（Charisma）一词来描述政界和艺术界杰出的有吸引力的显要人物。因此，约翰。F·肯尼迪、

K·恩克鲁玛②和披头士乐队被所有人誉为是“具有超凡魅力的人”。人们或暗或明地运用这样一个循环论证：“X在公众眼里是一个有吸引力的人物，所以X有超凡魅力；使X能够吸引公众的东西就是他的超凡魅力。超凡魅力是杰出成就的证据、根据和原因。”当然，我们不能说在所有杰出人物身上都同样具有超凡魅力的品质。肯尼迪及其家族都富有超凡魅力，赫鲁晓夫却很少有这种超凡魅力。到本世纪七十年代，超凡魅力不再是一个常用的语词了。人们不再说尼克松、希斯或蓬皮杜有超凡魅力——还有，我认为其原因主要不在于他们不是肯尼迪、威尔逊或戴高乐。我们应该把“超凡魅力”一词的使用主要归因于韦伯。我们下面将看到，这种用法是否歪曲了韦伯的思想。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韦伯是从神学中得到这个词的：有超凡魅力就是有神的魅力、上帝的魅力，就是有圣托马斯·阿奎那所说的“上帝所赠予人的”东西。于是，超凡魅力就不是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不属于物质世界或社会世界。它是虚无缥渺、不可捉摸的东西。它在社会学家的著作中的作用，涉及到通过科学和学间的一般手段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和概念，尽可能地理解人们是如何结合——或未能结合——在一起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间题。

使韦伯居于引起广泛注意的地位的第二个因素，部分地存在于所谓“新教伦理”的形而上学实体之中。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是说，新教伦理这一概念在韦伯的实际著作中完全是在形而上学意义上使用的，而只是说，它在许多现代思想中所起的作用是形而上学的。因此，我们很自然地发现韦伯把日本、新加坡和香港经济的飞速增长归功于新教伦理——这种关系发生在几乎不知道基督教,对新教的了解更是微乎其微的国土上,这是令人惊奇的。（在一种歪曲得面目全非的形式里，这些幸运的东方小岛的成功被归因于“与新教伦理有相同功能的东西”。我不能确定这是不是更好。）还有,我知道一本广泛地用于英国中学的历史课本，它用节俭和勤勉的新教伦理来解释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认为正是依仗着这两种伦理品质，资本才积累起来，技术发明才被诱发出来。这使我们想起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提出的这样一个解释：鸦片引起昏睡，是由罂粟中的催眠素所致。用新教伦理来解释工业革命的发展，的确与莫里哀的戏剧中的这个解释一样是形而上学的。后面我们还会谈到这些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韦伯的大部分冷冰冰的著作对于经常光顾图书馆的那些人的影响。这些著作的风格甚至使以德语为母语的人都为之畏怯，它们经常被转译成比地道的英语更难理解的一种英语，或者被翻译为一种借用着许多德语名词的特殊法语——例如，"Le historischer Kausalzusammenhang"（历史的因果关系）。从分门别类排列的这些著作中，你会发现十九世纪德国学术界所特有的那种显赫的威望和抑郁忧闷的感觉。德国精神在知识界的成就是令人信服的，但也是令人生畏的。韦伯的思想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他的著作显得晦涩难懂（当它们未被读过时更是如此），但其中也处处闪烁着真知灼见和预言的光辉。结果，韦伯被人们看成是占星家之流的人物。

此外，韦伯的著作还具有这样一种性质：人们一读它们，就会有一种神秘感和一种饶有兴趣但又得不到满足的感觉。韦伯的著作大部分由韦伯死后被人们收集在一起的材料组成。韦伯在学术上雄心勃勃，具有渊博的学识，其能量象火山一样偶尔猛烈地爆发出来。结果，他想要完成、充实和提高的大量思想便以杂乱的文章、专题论文、纲要以及大学生整理的讲课笔记等等形式留给了后世。借此责备韦伯是不行的，因为，在我

们这个世纪里，谁也顶料不到自己会在五十六岁时不幸去世，谁也不应仅仅为了在他实际上力所能及的智力范围之外进行了尝试就横遭指责。然而结果是令人气愤的：在他的著作中，渊博与肤浅相伴同居，机智雄辩、严谨周密与枯燥无味、迂腐烦琐混为一体。因此，向韦伯请教，就多少象是在猜谜，象是在打塔拉特纸牌①，或用《易经》打卦占卜。这并不一定会损害韦伯的名望，并且由于真正的杰出——有时甚至未必是真正的杰出，具有这种因素的名望，可能以学术上的评注、批评、争论和解释的知识产业形式，开辟了给韦伯带来声誉的另一源泉。今天，国际上已经出现了韦伯研究热，我殷切希望这本小册子能对此有所贡献。

然而，最为重要的是在韦伯的盛名背后的第四个因素：如果说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视野本质上是受历史立场和历史方法支配的，因而达尔文主义是一种历史生物学，而弗洛伊德主义是一种历史心理学的话，那么，二十世纪末叶便是社会学的时代。在社会学中，韦伯被尊为圣徒，被视为“社会学之父”，对他既不可以怀疑又不可以加以实际的利用——他只是人们崇拜的对象。甚至连

他的批判判如马尔库塞等都常常受到他的迷惑而不能自拔。在许多社会学家和大部分普通民众眼里,他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社会学家。经济学中的马歇尔或凯恩斯，人类学中的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或拉德克利夫一布朗（Radcliffe-Brown),物理学中的普朗克和爱因斯坦，在他们各自的学科里当然都是具有伟大历史性意义的名字，当然都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一个大学生，一个探索者或一个实践者，可以通过阅读他们的著作而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洞察力，但是他们的著作已经通过后人的扬弃而汇入到他们各自的学科里了。另一方面，在人们心目中，韦伯远远不止是这样一种形象。我称韦伯为占星家，对于职业社会学家尤其是社会学的门外汉来说，他是一个活的精灵，一个永远精力旺盛的活着的权威。似乎可以与韦伯相提并论的人是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的法国人埃米尔·杜尔克姆（Emile Durkheim)，然而他们实际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我以及目前整个社会学界来说，杜尔克姆都是一个伟大得多的社会学家，大家完全明白他已是过世之人，并且他成了社会学史的一部分。但是，韦伯这座矿藏现在还刚刚被人们所开发，还只是处在被筛选的阶段，所以，我们可以从他那里获取到有价值的和有用的东西，而摒除

掉那些业已证明为谬误的，使人陷入更门邪道的，混乱的和过去经常出现错误的东西。这种扬弃的过程目前还刚刚开始。

：韦伯似乎不是一个政治先知，不象马克思那样成为一种世俗宗教的奠基者。我认为，他的确更是个意识形态学者，并且比一般所假定的那样更多地为了意识形态的理由而被崇敬。但是，甚至没有一个人是或已经是一个泛泛的韦伯主义者。而在这种非常不严格的意义上，人们却可以说某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确，人们相信韦伯是一个伟大的社会学诊断学家和作者，他现在还能够告诉我们关于工业社会和我们这个可怕而有益的世纪的起源和真正本质。的确，人们相信他揭露了在我们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里的混乱和悲惨的趋势。的确，他在某些方面有意或无意地是一个典型的感情外露的德国人——并且德国对于欧洲乃至世界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和仍然很神秘的事实。韦伯既有难以捉摸的一面，又有通俗易懂的一面，因此，他对于我们解开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的许多疑团，对于了解随后的纳粹德国，对于推测关于现代权势和活动的许多难以预料的争端，既是一个向导又是一条线索。于是，他的名望便决定于他的模棱两可和没有得到承认的或没有表达出来的信念 恰当地解释韦伯,就会很容

易地要现，在他个人身上隐藏着理解特定社会和现代社会的钥匙。

如果可以用前面我所用过的隐喻和说法的话，那么就可以说社会学是人类自我意识的一种主要形式，是一种不尽完美的镜子，通过它，我们可以看到被反射回来的社会映象，就象希腊神话传说中的柏修斯看到美杜莎①的脸一样，这张脸对准那个人，那个人就会化为石头。社会学既使得社会在我们面前显现出来和清楚起来，也通过与人们直接了解到的明显现实保持一定距离而使社会经得起分析和服从分析。正是这种性质赋予社会学以众所周知的力量。这种力量远胜于人们从它那实际成就的性能中可以期望的任何东西，因为这种性能虽然仍有价值，但却受到很大限制。韦伯逝世后，他的著作大批大批地被编辑出版。这些著作带有做学间的严肃态度和浪漫主义的热情色彩，特别是带有它们的不确定性和内在的矛盾—— 它们几乎完全满足了为社会学家同仁们所秘密分享着的、一个关于社会学家的普遍观念。

如果韦伯不是一个神秘人物，以上描述可能不会这样确实无疑。与他同时代的伟大社会学家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

们都有清晰表达思想的天才，这并不是说他们的著作很容易理解。对于内容上很艰深的——况且社会就不是简单的——东西是很难提供浅显易懂的读物的。此外，如果一个人也是创宗立派式的人物的话，要找到一条理解他论述深奥主题的文章的捷径，就很可能难得如愿以偿。然而，帕累托(Pareto, 1848—1923年)①、杜尔克姆(1858—1917年)和霍布豪斯(Hobhouse, 1864—1929年)，决非神秘人物，他们会犯错误，可能有荒谬好笑之处，也可能以谬论欺骗过自己，但是他们并不含糊难懂。人们知道他们的问题所在，知道什么是他们所认为的答案。他们的洞察力和坦率使我们惊讶不已，他们的天真使我们感到困惑，但是他们却引导我们走出了许多迷宫。韦伯把我们引入迷宫，却不用阿里阿德涅（Ariadne）的线团把我们带出来。人们或者可以说这是韦伯的功绩，声称生命和社会实际上如此，并且没有别的人能够这样深入到生命和社会的迷宫之中，或者人们也能把这视为韦伯失败的证据，这种失败属于伟大的力量和伟大的努力所受到的挫折，因此比成功更光荣。这里我必须承认，在读者头脑中存在的一种偏见，在科学和学术上，人们宁要成功不

要失败，并且，当我承认社会是难以捉摸的和迷宫式的时候——舍此还能是别的什么呢？——这种承认只会加强我需要各种清晰的迷宫地图的愿望，既使它们真正揭示了未被探索过的地区，标明了悬崖峭壁的所在位置。

最后，如果我们生活在社会学的思想世界里，我们就不得不面对韦伯的另一个方面——作为典型的和卓越的社会学家的一面。由于种种缘故，卡尔·马克思以社会学家的新身份恢复了自己的名望。有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既不是——也不在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想要成为——一个社会学家，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多。对于那些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社会学的人来说，韦伯却是一个非常有力的反对者。然而既然在一切对抗中也存在着互相补充的因素，那么，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和韦伯就可以看成是对立的两翼，是两个原始模型了。我希望，书中的论述至少将纠正那个错误观点。

第 2 章

韦伯的生平

1864年4月21日,马克斯·韦伯出生于图林根的爱尔福特城。图林根现在已变成共产主义的民主德国的无名之地，但在1864年它是普鲁士领土的一部分。普鲁士是使韦伯一生都为之炫目,为之挂怀的故地，在当地新教的影响下，他的家庭成为虔信新教的家庭，他的父亲的祖辈是路德教徒，当奥地利帝国打到比勒费尔德（西德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洲）时便开始逃难，后来成为大布商。他母亲的家庭可以追溯到威廉·冯·瓦伦施泰因，他是一个德国人，曾在伟大的“北方之狮和新教信念的堡垒”古斯拉福斯·阿道普斯的军队里服过役。瓦伦施泰因一一在瑞典语里拼成法

伦施泰因——一家曾出了许多知识分子，中学教师或者苏格兰人所谓的教员。他们中间一个人有着普普通通的生涯，喜欢酗酒，抛弃了他的法国新教徒的妻子。他的儿子G·F·法伦施泰因,象父辈一样经历了一个时期的心灵错乱，后来成为德国浪漫的国家主义和“种族优越性”的积极倡导者他投入过反对拿破仑的战斗，然后加入了1815被占领的巴黎的宪兵行列。在随后的年月里，他成为德国西部的杜塞尔多夫城的一名官员。在巴黎，他把对法国革命的自由观念的依恋之情揉合在他的浪漫的德国国家主义和他对拿破仑的仇恨之中。结果，在复辟时期的怀疑社会里，他的职位一直得不到提升，直到1832年他才成为科勃兰兹的议员。1935年他在那里第二次结婚，娶的是埃米莉·索茄，其女儿海伦·法伦施泰因就是马克斯·韦伯的母亲。

索茄一家后来对他们沦为必须事事谨慎小心的难民经历作过一个记录。他们出身于正统的卡尔文教徒。他们是在1685年撤消对于付格诺派（Huguenots）的宗教宽容后，从法国的奥尔良逃过来的。在法兰克福，他们从商业上取得了成功，在伦敦和曼彻斯特都设有分店。这次婚姻使法伦施泰因的经济情况大为好转。1842年，他迁往柏林为普鲁士政府服务，但是，在新的工作岗

位上他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于是， 1847年他便退休到了海德尔堡。在那里他埋头撰写了一些优秀的著作，并且跻身于为历史学家施洛塞尔（Schlosser）及其学生格维努斯（Gervinus）所统辖的学术圈子里。这种友好关系对于年青的韦伯的命运当然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施洛塞尔是兰克（Ranke）所创导的新的"科学的"历史的反对者。他曾说，没有什么历史能够摆脱价值判断和从非历史的思考中所引起的先入之见。历史学家有评判人和事件的道德责任。历史不仅是一种自我教育的活动，而且是一种伦理活动，这种伦理活动形成了它的学生们及其公共生活的特征。格维努斯是由于其立宪主义而被汉诺威王朝解职的七个格延根大学教授之一，他加入了1848年的自由法兰克福议会，支持建立一个联邦德国，并且温和地反对俾斯麦和霍亨索伦家族的专横跋扈。韦伯注定一生都要献身于由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这些问题的艰苦而缺乏说服力的解决之中。但是，格维努斯的影响不仅仅限于智力上，他一直到死都对韦伯的家庭和韦伯的身心成长发生着影响，因为法伦施泰因死后，格维努斯就住到了法伦施泰因家里。他设法开导韦伯的母亲海伦，后来便想方设法要安排海伦与他的一个学生结婚。为此，海伦躲避到在柏林的姐姐即

历史学家鲍姆加登的妻子家里，在那里她遇到了老马克斯·韦伯，并与他结了婚。她从来没有克服自己对性生活的恐惧，并且，这次婚姻也是不幸的，缺乏温情和令人不快。

她与之结婚的这个男人，是比勒费尔德家的小儿子，生于1836年。他的长兄通过合理改革过的资金投放制度对布匹业进行了改造，并在事业上取得了显赫的成就，成为一个非常活跃的企业家。作为最小的弟弟，老韦伯由于接受的是律师训练，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则成了柏林的一个文职人员和新闻记者。他是一个热心的君主主义和俾斯麦主义者。他作为行政长官前往爱尔福特，在他的儿子出生后，又回到了柏林，在普鲁士政界从事一个较小的但却成功的职业。评论者把他的观点说成是自由主义的：除了霍亨索伦家族统治之下的普鲁士外，决没有别的国家会赞同把特赖寄克（Treitschke）①或象他这样的人看作是自由主义者。然而，老韦伯在政治上的错误从一个方面看是可以理解的。在德意志帝国决没有形成过真正的保守党。这个新帝国在某些方面常常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里合法性不能来源于过去的聪明睿智，尽管是悠久习俗（mos maiorum）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